

# 我的 愤怒 青春 岁月

(德) 佳本恩 Adrian Geiger 著

史竞舟译



WIE DIE WELTREVOLUTION  
EINMAL AUS  
VERSEHEN IM SCHWARZWALD BEGAN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目 录

中文版序 .....	1
第一章 黑森林里闹革命 .....	2
第二章 爱的禁区 .....	8
第三章 自动步枪与和平鸽 .....	47
第四章 人在莫斯科 .....	95
第五章 潜入红灯区的探子 .....	117
第六章 长鼻子老外在上海 .....	144
第七章 中国特色的“小资” .....	180
后记 .....	205

## 中文版序

本书根据作者真实经历撰写。为尊重他人隐私起见，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均使用化名，细节方面也作了相应改动，其中不乏汲取发生在多个不同真实人物身上的故事，融合塑造为一个人物形象的情况。本书并非自传，故不要求完整。对于同本书故事情节不甚相关的工作地点及私人关系，作者已进行了删节。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自他说这话，一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期间，中国人的确征服了整个世界，不过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前不久，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到德国旅行，想给家里人带几双阿迪达斯运动鞋，当她在一家店里问有没有不是 **Made in China** 的阿迪达斯时，却引来了售货员们的讪笑，因为这里所有的阿迪达斯都是——中国制造。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桀骜不驯的“愤青”，外祖父越是危言耸听，我就越是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着迷。所以在我的生命里，我一路向东，越走越远：从西德到东德，然后是苏联和独联体，再后来是中国。

当然，那时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认识还很肤浅。我走过了那些陌生的国家，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经历了许多文化冲击，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它不仅反映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叙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挣扎。

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是一条移动的界线，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摇摆不定。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墨子（公元前 486-376 年）

## 第一章 黑森林里闹革命

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我对这个老家伙很是反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说到底，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毛头，连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一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的方面我也非常保守，严格地说，我还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就是在一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这我老妈还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作“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1933 年以前他曾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之后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因为唾弃纳粹而在二战即将结束前不久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定为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和“毛圣经”都抱有一种宽容态度。

十二岁的时候，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浮士德文理中学大礼堂里的时候，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母亲的娘家姓叫茨威富尔，这个词在德语里恰好是“怀疑”的意思。当年，身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亲在飞机上一见钟情。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抱怨。我的妹妹乌拉，多年后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当时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她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六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而且“今天就谈”。电话里是不能说的，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

是不是卡勒又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也许今天我们要去张贴革命海报，宣传反对右翼势力的摇滚乐，或者反纳粹、反排外主义的音乐会？要么是去喷刷反对中子弹的标语？——我们经常这么干。可卡勒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却那么紧张，同时还有点郑重其事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从斯陶芬到弗莱堡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我一个人站在足球场对面的马路边，张望着有没有可以搭乘的过路车。气温不到十度，我冻得浑身哆嗦。过了没一会儿，天上就开始飘雨。我身上只穿了一件毛线衫，而且为了显示潇洒还故意敞着怀。眼见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开始焦躁起来。这些司机肯定是看了《图片报》上的那种公路抢劫的新闻，所以把路边每个等着搭便车的人都当成了嫌疑犯。想到这里，我不满地朝那些汽车远去的背影挥挥拳头。

已经两点五十了，离我和卡勒约定的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了，迟到的话会很尴尬，尤其是在他这个劳工青年团（也就是德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县区干部面前。

正当我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辆车在我面前戛然而止。开车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留着时髦的短发，浓妆艳抹，衣着大胆。当时的我还只是个不起眼的毛头小伙，毛线衫下面套着已经褪色的旧T恤，下身是再普通不过的条绒裤，脚穿一双破旧的球鞋。我个头一米八，人却瘦得像麻杆一样，简直可以在电影里扮演瘦骨嶙峋的集中营囚犯，脸上还长着雀斑，蓬乱的头发盖过耳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傻里傻气的眼镜，无论从哪一点看，我都绝对不是一位时尚男士。但眼前这个女人却似乎对我这样的青涩男生格外偏爱，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肆无忌惮地放到了我的腿上。我厌恶地把身子挪开，心想：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难道想老牛吃嫩草不成！她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回斯陶芬，她都可以送我。我谢绝了。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去见卡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和我不同的是，卡勒并非“小知识分子”（提起知识分子他总是满脸的不屑，而且总要在前面加个“小”字），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匠。他长发披肩，模仿列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还总穿一条鲜红色的裤子，号称这样显得更有革命气质。在学生聚会上，我总是暗自躲在一隅，怯怯地旁观别人谈情说爱，而卡勒则全然不同，他是个能把很多女人——当然只限于志同道合的团员同志——拥入怀中的调情高手。得逞后他总会问那些姑娘：“和领导在一起感觉如何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女朋友玛尔格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省钱，卡勒平时住在父母家里。为了防止别人偷听，我们俩撑着伞、冒着冷雨走在他们家的园子里，边走边谈。“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那个梦想吗？我还从未对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三年前我就入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

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许正是因为结巴，所以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球队，这让我觉得总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可在共青团里不一样，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纳我。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里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是团员中的骨干、党的精英，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我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心里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们都要被我从坟墓里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的，这不是兼职——这是天职！而且安排天职的人只能是党，而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况且他自己也说要和我做一次干部谈话。

“问题是，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卡勒说，“不过你在过去几年里表现不错，参加了团委和党委组织的所有活动。在你的倡议下，我们还往费尔宾格这个老纳粹身上扔过鸡蛋，迫使他后来不得不下台；你还为共青团招募了二十名新团员，成功地组织了罢课活动。组织上很信任你，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个问题——你做好走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你得认真地想一想再做决定，这可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做出许多牺牲。一旦你做了选择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职业革命家是要战斗一辈子的！”

虽然这番话听上去有点故作高深，但看到他能这样严肃地和我谈话，倒也说明我是个受组织重视的人。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卡勒对我的毛遂自荐并没有生气，恰恰相反，以他为代表的党组织为我设计的革命前途与我的个人愿望竟不谋而合。当然再没有回头路可走，资本主义企业怎么会雇一名革命者呢？不过我可不想到那种地方工作

——绝不！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肯为金钱卖命？我要从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事业！什么医疗保险啊退休金啊，那都是俗人才考虑的东西；何况等我老了的时候，社会主义红旗早就插遍全球了，还担心什么福利！

“卡勒，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条什么路。很高兴你能给我这样的建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嗓音尖尖的，像个女人。

“亚德里安，我现在跟你所说的事，仅限于你我之间，绝对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不许对同班同学讲，不许对父母讲，也不许对其他同志讲。”为了强调他的话，卡勒停顿片刻，又接着说，“我知道，‘红色经典’你比我读得多，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来难不倒你，不过你还需要继续巩固你的意识形态教育。所以，作为要成为未来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我们决定委派你去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

我不解地望着卡勒。对于党内的密语我掌握得不错，可“为期一年的培训”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秘密？短暂沉思之后，我提了一个听上去尽量不显得愚蠢的问题：“我要在哪里接受培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像我刚才说过的，具体的情况要严格保密。你会及时得到指示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一年！完成秘密任务！我强忍住自己的喜悦，以免在他面前显得太过幼稚。卡勒毕竟比我年长五岁，对于这些事了如指掌。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经参加过抵抗希特勒的地下活动。卡勒的父亲是巴登-符腾堡地区的组织部书记，负责人事和组织政策，也就是说，是位职业革命家；卡勒的母亲是党的地区支部出纳，虽然只是个名誉职务，但大小也算革命人士。到干部学校进修的事当然必须保密，这个我懂。作为西德人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革命培训，这在今天就好比派一个美国人到基地组织的大本营里学习自杀式袭击。

卡勒脸上“不自由、毋宁死”的严肃表情稍稍有所放松，他说：“最棒的是，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我也接到委派任务了。”接着他又笑着补充道，“我负责监督你。”

我兴奋之极，充满传奇和冒险的革命生涯正在向我发出召唤，而且有我熟识的朋友结伴同行，心理上会更加安全。我也为我的朋友卡勒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也将荣升为秘密组织中的革命干部了。我浮想联翩，开始憧憬着这样的情景：当我的高中同班们正在上大学、服兵役，积极谋划庸俗的小市民幸福生活时，我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家人朋友讲，但就像卡勒所说的那样，随便编个什么“天方夜谭”还是容易的。

现在我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共青团员了，而是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一名革命干部。六个星期之后，我和卡勒一起乘火车前往多特蒙德，去参加为将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秘密培训而组织的筹备会。后来我得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其他，正是民主德国。

生平第一次，我踏进了劳工青年团中央神圣而庄严的办公大楼。这是一栋貌似平常的水泥建筑，钢制的安全门上装有监控摄像头，这是联邦德国这个由资产阶级敌人控制的国家内一些不屈不挠的抵抗分子的大本营。面对新纳粹和国安局的袭击和骚扰，我们必须自我保护，这就是此处之所以戒备森严的原因吧，我心想。

我和卡勒被带到了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在这里见到了另外三名被选拔出来的同志，他们将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团中央一个两米高的大个子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他一直在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大批特批，斥责他们“搞泛欧洲同盟，大有退变为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我不解地问道：“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团结一致反对右翼势力吗？”讲话的同志宽容地笑了笑，说：“我们赞同所有左派和民主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我们绝不容忍投敌叛卖者。关于这一点，将来你们还会‘在校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育。”“在校上”？这还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词汇。尽管我心中一时

还充满疑惑，但想到自己已然成了这个秘密同盟中的一份子，骄傲和自豪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

接着，劳工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开始切入这次预备谈话的“核心点”——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问题。只听他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是受了委派的，肩负明确的战斗任务，那就是学习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最终将它们运用在这里——联邦德国。你们的战场是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战斗”这个字眼，“你们将在学校里遇到来自全世界的战士们，来自欧洲的，来自智利、越南、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当然了，还有来自民主德国的‘自由青年团’团员。大家必须要牢记一点，那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绝不允许的！”

谁也没有听明白最后这句话和报告的其他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就连经验丰富的卡勒也不明白。团中央的报告人试着加以解释，但他的表述听上去颇有些复杂：“我们必须汲取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同志只顾沉湎于男欢女爱，却把自己的战斗任务抛之脑后。这些行为如此轻率的人，他们要为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负责！”

原则上，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专门针对以下情况：与他人发生恋爱关系者，日后很可能会到对方国家生活。而我们应当在结束了一年的培训之后在联邦德国继续战斗，因此——严禁恋爱。

我对此没有异议。对我来说，为了革命事业，过一年苦行僧式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

## 第二章 爱的禁区

我十九岁生日时收到的第一句祝福，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的一名军官。九月三日凌晨三点，在六人座火车车厢里睡意正浓的卡勒和我被这位军官推醒，当时我们正在从弗莱堡去往西柏林的途中。“我注意到了，今天是您的生日。生日快乐！”他说。尽管我们只是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前往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研究着我的护照。他的认真和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份刻板 and

执着充分说明了普鲁士精神和马列主义是可以辩证统一的。这位同志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是自己人。从外表上看，我们和所有以私人身份前往西柏林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一路上也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早上，我们在西柏林动物园一站喝了咖啡，吃了肝泥肠小面包——这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地界上的最后一顿早餐。接着，我们乘快速列车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也就是东、西德之间的边界线。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护照，而当时过境的西德人必须持有护照。卡勒安慰我说：“别担心，边防军同志们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了。”我还学到了一个新名词——“接应”，它是指某些人通过秘密渠道，可以在不持有护照的情况下直接跨入民主德国的地盘。这听上去就像是冲着柏林墙默念“芝麻开门”，虽然从西往东越过这道墙并不是通常的方向。

我回忆起了和班里同学一起乘车去布拉格的情景，当然那次是有护照的。表情生硬的东欧边防警把我们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就差掏衣服口袋了。光检查护照就用了十多分钟，摆副冷脸似乎是他们执行公务时的规定。当然了，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必须显示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面貌；更何况，我们班上的很多人正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黑市上兑换德国马克。

带着脑海里浮现出的记忆，我扫视了一下眼前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看到几个一脸阴沉、荷枪实弹东德边防兵，还有几只在火车下东闻西嗅、搜寻越境逃亡者的警犬。当时我把这看做必要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大批的医生和工程师涌入西德，才能避免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东德被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偷越柏林墙者，一经发现即当场击毙——对于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上方命令，我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首名为《致后来人》的诗中找到了辩护理由：

面对卑鄙  
无法不咬牙切齿  
面对不公  
不能不大声疾呼

我们这些追求友善的人啊  
对待敌人却不能心慈手软

尽管如此，当我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连接东、西德的那条狭窄的过境通道等候检查时，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检查护照时，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只会讲英语，我听到岗哨上的东德边防兵在用德语对他骂骂咧咧。那个军官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呢？我的心里不由得更加七上八下。

轮到我了。卡勒示意让我先来，为了不在他面前示弱，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一颗心怦怦乱跳。我出示了自己的护照，里面没有签证。我紧张不安，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魔咒——“我是被接、接应的。”边防警瞥了一眼护照上的名字，脸上的表情霎那间由阴转晴，他笑容可掬地说：“同志，热烈欢迎您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然后从登记簿里拿出一张准备好的单页签证，而没有在我的护照上加盖过境章——这样一来，我回国的时候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就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东德待过一年。此刻，那位友好的同志朝我眨了眨眼，把我的证件递了过来，临别时对我说了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这种祝福我还是头一次收到。在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我们坚信它绝不是最后一个——卡勒也得到了同样方式的欢迎。

当我们走下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楼梯，踏上东德领土时，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生活。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伴我左右。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滑雪衫，对卡勒说：“我的衣服也沾上这个味儿了。”我们两个都笑了。乘着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德。

这里虽然没有西方那种五光十色的繁华，但一贯对消费社会抱以鄙视态度的我并不感到遗憾。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些宣传反共思想的敌方言论也把我推向共产主义：在东德买不到香蕉，在东德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十年——与那些“大问题”相比，凡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不足挂齿。在这里，掌握政权的不是昔日的

纳粹余孽，而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东德的环境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之前我曾经对东德做过一周访问，当时是和代表团随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即民主德国的共青团组织——为我们这些西德同志安排的活动。

火车站的报亭挂着《新德国》，还有共青团办的杂志《青年世界》和《新柏林画报》。“幸好这儿没有《图片报》！”我说。卡勒点点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 1968 年反对《图片报》的游行示威，没能加入高喊“打倒施普林格”的愤怒人群。但我们却读过君特·瓦尔拉夫的《头版头条》。作家瓦尔拉夫以通讯员的身份化名潜入《图片报》编辑部，揭穿了媒体的谎言；我们也熟悉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书中无辜的女主人公正是被一家类似《图片报》的媒体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自由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多少价值，“报禁”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进步。

为了避免西德的边防警察找麻烦，我们没有把路线指示写到纸上，而是记在了脑子里。从火车站出来沿弗里德里希大街右行，然后在菩提树下大街朝右拐，便可径直来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总部。我们找到了菩提树下大街 36 至 38 号的一栋五层的钢结构建筑，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眺望勃兰登堡门。拥有两百万青年团员的庞大组织就隐藏在这栋办公楼的窄门后面。楼里的接待大厅小得就像是牙科诊所的门廊。一位身材肥胖、穿着灰绿色制服的民警亲切地招呼我们，答应说马上“通报”，一边拿起电话听筒低声咕哝了一句。

紧接着进来两个黑人。这两位非洲同志也许是我们未来的同学呢，我心想。胖民警马上声色俱厉起来：“请二位出示‘旅行证明’！”他本可以用国际通用的“护照”一词，这样的话那两个黑人朋友就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了。见他们没有反应，民警提高嗓门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拿证明，快点！”见此情景，我自告奋勇要给他们充当英语翻译，不料那位民警训斥我说：“请不要多事！”

卡勒和我面面相觑。我们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样东西：种族主义——难道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种族歧视？这可不符合我

们的世界观。在我们的概念里，种族主义是独属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民警终于允许非洲客人坐下，他自己则扬长而去。我不由抱怨道：“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在团中央工作！”

卡勒说：“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

这句简单的解释更让我恼火，我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呢：“列宁早就说过：改变经济制度是容易的，改变人的意识却很难，需要几百年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担负起党的领导职责。”如此一来，完好无恙的社会主义世界又在我们心中重新建立起来。

没过多久，安德里亚、彼得和乌里克到了。他们几个分别来自汉堡、奥斯纳布吕克和杜塞尔多夫，在多特蒙德的预备会议上我们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大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而接待我们的大个子留着小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年纪看上去都足够当我们的父亲了。他自称弗里茨，是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要远远胜过我们熟知的那些“教书匠”。他是我们的同志，穿着朴素的毛衣牛仔裤，对我们以“你”相称，亲切地询问近来西德和平运动的情况。我们一路跟着他来到办公大楼的食堂，在这里见到了艾尔克女士，她介绍说自己在共青团中央负责“对西德方面的外联工作”。艾尔克虽然并不年轻，却穿着入时，待人随和，看上去颇像一位气质不凡的作家，当然她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女革命者。共青团竟然让这些上了年岁的干部来领导，这让我很是不解。但艾尔克的热情很快便打消了我的疑虑。

在团中央的食堂里，我们头一次品尝到了所谓的“混合咖啡”。东德的咖啡供应不足，通常要掺上麦芽咖啡作为代用品。对这种日常生活里的小小不适我倒并不介意，与面临美国中子弹威胁而命悬一线的全人类的生存相比，这些问题简直是轻如鸿毛。“我们把这种咖啡叫做‘埃里希加冕’。”弗里茨的玩笑让团中央的女干部也忍俊不禁。只有被提到的国家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居高临下，从巨幅画像上朝正在围坐享用“混合咖啡”的我们投来严肃的目光。东德的人也挺幽默呢，我心想。这使我对自由青年团产生了几分好感。唯一让我不悦的是，

在青年团的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用餐，团中央主席克伦茨和其他高层干部却在另外一个食堂。尽管无从对这两个食堂的伙食待遇加以比较，我依然认为这绝对是违反原则的。难道正如东德的左翼批判人士所断言的那样，在东德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班主任弗里茨宣布说，他将为我们五个从西德来的年轻同志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列哲学课程；另外的教师会给我们传授其他革命知识。“首先，你们将在这里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弗里茨说，“到目前为止，在代表团里你们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从今天起你们将会了解到民主德国的真实面貌。”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惊。以前访问的时候，东德共青团的成员难道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当时我参观归来后，班上许多人不以为然地说，东德人只是在给你们做戏罢了！当时被激怒的我还为此和他们发生了不小的争执。而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了东德同志对我们的信任，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将伴随很多问题。我们不想把这些问题和弱点透露给自己的敌人，但作为革命骨干，我们理当了解一切真实情况。

弗里茨老师沉浸在对苏联的狂热幻想中，还把这个国家亲切地叫做“苏”：“他们比我们走得远，这一点总是被人们忽略，连我们这里的同志也免不了犯这样的错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又道出一番惊人之语：“如果苏联没有克格勃，生活还会照样继续；可如果东德没有国安局，大家会把我们挂到电线杆子上绞死。”

这就是说：大多数的东德民众是痛恨统一社会党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党所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统治。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话说回来，多数人的立场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比如许多德国人就曾经支持过纳粹，是苏联红军的到来解放了德国。很显然，共产主义者遭遇了阻力，不少人的脑袋里仍被旧日的残渣余孽所充斥。可难道二战过后长达三十四年的时间还没有将这些人的脑子洗刷干净吗？我不敢大声提出这些疑问。这倒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在真正的社会

主义国家度过的第一天，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缺乏意识形态教育的愣头青。

“你们得各自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弗里茨又说。什么，取名字？我们又不是没有名字！“你们需要化名，因为你们在东德属于非法居留，不能让西德那边的人知道你们来过这里。你们还会在学校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有丹麦的，芬兰的，等等。对于去西德参加培训的自由青年团员，也不能排除他们中间会有人叛逃的可能。”——“叛逃”这个词专指逃到西德去的东德人——“所以有几条禁令是你们必须遵守的：绝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你们的真实姓名，也不许让人知道你们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尤其要切记：严禁与他人交换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即便和某人发展私人关系时也绝不可以——当然了，建立私交也属于禁止之列。”听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风纪问题”。临行前，劳工青年团的主席曾一再叮嘱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给自己起动物的名字。“狗子”是卡勒的化名——“我要像条狗一样对党永远忠诚，我在家还养着一条可卡犬呢！”他说。汉堡来的同志马上管卡勒叫“革命狗”，但正式的化名还是定为“狗子”。我选择了“耗子”这个名字。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绰号了，我希望自己在和资产阶级敌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像一只机智狡猾的耗子，除此以外，我还是个出了名的杂食动物。安德里亚给自己取名“狮子”，彼得自称为“鳄鱼”，乌里克则摇身一变成了“美女蛇”，因为她想取一个听上去“有女人味儿”的动物名。弗里茨老师抱怨起来：“在你们西德的青年团里，女权主义的影响真是越来越严重了。”不过“美女蛇”这个代号最终还是被批准通过了。

我们坐着橄榄绿的小巴士，一辆二冲程的巴尔卡斯 B1000，告别了柏林，向着北方那未知的目的地一路进发。弗里茨老师说：“我们现在去的是民主德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他的话让大家充满期待，对我们来说，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已经够神秘的了。一路上，弗里茨不断地讲起此行的目的地。从他口里我们得知，我们将在那里

度过接下来的一年，那个地方曾经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爱巢’。1936年，柏林市将一片风光旖旎、湖光树影的绿地赠给约瑟夫·戈培尔作为他39岁生日的贺礼，还在上面给他建了一栋乡间别墅。当年，戈培尔曾经在那里和他的女伴们尽欲穷欢。1945年，苏联和波兰部队占领这栋别墅的时候，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党卫队走狗的拼死抵抗。战友们在野战医院里照料在战斗中负伤的同志。1946年，战友们把这块地方移交给了自由青年团，此后它一直是我们的干部培养基地。1950年，威廉·匹克将这所干部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于是有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这个名字。威廉·匹克的名字对我而言近乎神圣，他是民主德国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于1960年辞世。他在生前已经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所学校了？真有点不可思议。无论如何，毕竟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去什么地方，从今以后，我们将在那里被培养为职业革命家。

正当车子经过路边一块标有“严禁超车”的告示牌时，一辆黑色的苏联产“海鸥”轿车旁若无人地超过我们的“巴尔卡斯”绝尘而去，旁边还有闪着蓝灯的警车保驾护航。“是某位政府要员。”弗里茨解释道。看到特权如此大行其道，而且是在并无任何拥堵的郊外公路上，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此时我只能选择沉默。在万德利茨附近，我们穿过了一条干道，它的尽头正是埃里希·昂纳克和其他东德高层领导人戒备森严的驻地。

之后我们向右拐入一条林荫路。路牌上用德、英、法三种语言标示着“军事管制区，巡逻部队禁入！”的字样。混交林浓荫遮天，越来越密。几分钟后，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的林间空地进入了视线。载着我们的汽车停了下来。在松树和桦树的层层掩映下，隐约可以瞥见不远处的岗楼。一位民警走了出来，他像边防警一样探头到小巴士里，认出是弗里茨老师后，他摆摆手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车开进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的校园，我们来到了自由青年团的最高学府！

不一会儿，树林中出现了一片斯大林时代的宫殿建筑，那种气势宏伟的巴洛克风格我从不少苏联图片上已经有所了解。正如我们听说